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



呈现意义： 晚清中国新学领域 上

Mapping Meanings:
The Field of New Learning
in Late Qing China

〔德〕朗宓榭 〔德〕费南山 / 主编
李永胜 李增田 / 译
王宪明 / 审校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呈现意义： 晚清中国新学领域

上

[德] 朗宓榭 [德] 费南山 主编

李永胜 李增田 译

王宪明 审校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MAPPING MEANINGS
The Field of New Learning
in Late Qing China

EDITED BY
MICHAEL LACKNER
AND
NATASCHA VITTINGHOFF

BRILL
LEIDEN • BOSTON
2004

总 序

纂修清史是我国新世纪标志性的文化工程,它包括 3000 余万字的清史主体工程及文献、档案整理和编译工作。广大史学工作者正以高度的民族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努力做好清史编纂工作,科学总结历史经验,继承和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

世界各国从分散发展到趋于一体,大抵从 15 世纪、16 世纪开始,直至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形成了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和世界体系。清朝从 1644 年到 1912 年共延续了 268 年,这是世界历史发生深刻变化的重要的转折时期。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清王朝却依然以“天朝大国”自居,闭关自守,使封建社会的中国越来越落后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洋枪洋炮面前不堪一击;西方列强用大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使之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在 18 世纪世界历史的大变局中,康乾盛世不过是中国封建社会“落日的辉煌”,而到 19 世纪中叶鸦片战争后,清朝日益衰颓,已奏起了“落日的挽歌”。因此,研究清史,确定它的基本内容,以及确定研究它的基本理论、原则和方法时,不能脱离清王朝社会发展过程中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的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

在编纂清史时要有世界眼光,这已是广大史学工作者的共识。不仅要把清史放到世界历史的范畴中去分析、研究和评价,既要着

眼中国历史的发展,又要联系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而且还要放眼世界,博采众长,搜集和积累世界各国人士关于清代中国的大量记载,汲取外国清史研究的有益成果,为我所用。正是从这一基本认识出发,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决定编辑出版“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以下简称“编译丛刊”)。

清朝建立之初,曾与世界各国保持一定程度上的接触。后来中国的大门一度被关闭而后又被强行打开,这期间,外国的传教士、商人、外交官、军队、探险家、科学考察队蜂拥进入中国,东方古国的一切都使他们感到惊奇。基于种种不同的目的,他们记录下在华的所见所闻。这些记录数量浩瀚,积存在世界各国的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或私人手中,成为了解清代近三个世纪历史的珍贵资料。由于西方人士观察、思考和写作习惯与中国人不同,他们的记载比较具体、比较广泛、比较注重社会的各个阶层各个方面,因而补充了中国史料记载的不足。“编译丛刊”将从中选取若干重要资料译介绍给国内的读者;对早年问世的具有开拓性、奠基性价值,但不为中国学术界所熟知的作品,我们也将同样给予关注;此外,对反映当代国外清史研究新的学术思潮、前沿问题、热点问题和重要成果的学术专著,“编译丛刊”也将及时地介绍给中国学术界。

从中国史学的历史与现实出发,有选择地介绍国外新史学的一些理论与方法是必要的。如西方历史学家提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历史学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了”,主要是强调扩大历史学家的视野,拓宽历史研究的选题;又如提倡“自下而上看的历史学”,努力将社会精英的历史变成社会大众的历史,将千百年来隐藏在历史幕后的社会大众推上历史的前台。此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历史研究整体化趋势的推动下,出现了一系列历史学分支学科,如社会史、人口史、民俗史、新经济史、新政治史、心理史、社会生态史、环境史、妇女史、城市史、家庭史等等,对于纂修清史有一定的借鉴作用,这些都将在“编译丛刊”的作品中有所体现。

人类的文明史就是一部不同文明间不断交流和融合的历史。任何国家的文化都是通过与异质文化的对话和交流获得营养,从而不断发展壮大。纂修清史必须排除闭关自守的文化排外主义的干扰,破除中西对立的僵化思维方式,以开放的胸襟、兼容的态度和科学的精神对待国外清史研究的一切成果,因为它们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愿“编译丛刊”在新世纪中外文化交流的广阔背景下,作为一座科学的桥梁、友谊的桥梁,为纂修清史做出更多的贡献。

于 沛

2004年5月

致 谢

本书的论文选自提交“晚清西学译介”国际学术讨论会的论文。本次会议作为“近现代汉语学术用语的形成”(Wissenschaftssprache Chinesisch, WSC)研究项目(1996—2000年)的一部分,1999年12月由哥廷根大学东亚研究系主办召开。首先我们要特别感谢大众基金会(Volkswagen Foundation),它通过捐赠和各种形式的财政帮助,不仅赞助了本次规模不同寻常的大型会议,还在项目存在期间,对整个项目研究进行了支持。项目主管希尔特格德·吉勒(Hiltgund Jehle)对本项目各种各样的活动的实现作出了不可估价的贡献,我们对她持续不断的努力表示特别的感谢。

没有会议参加者的支持,本书是不可能完成的。他们不厌其烦地解答我们提出的令人困扰的问题,并没有因这艘船下海速度比预期要慢而跳离此船。我们对他们的耐心 and 情愿表示深深的感谢。我们还要对那些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其论文没能收入本书的会议参加者和参与会议讨论者表示感谢,他们都为增强本书和会议的学术精神作出了很大贡献。这些人包括 Chow Kaiwing(周启荣)、Fang Weigui(方维规)、Han Qi(韩琦)、Christoph Harbsmeier(何莫邪)、Lai Chi-kong(黎志刚)、Li Guilian(李贵连)、Lydia Liu(刘禾)、Federico Masini(马西尼)、Barbara Mittler(梅嘉乐)、Shen Guowei(沈国威)、Su Xiaoqin(苏小芹)、Uchida Keiichi(内田惠一)、Wang Yangzong(王扬宗)、Catherine Yeh(叶凯蒂)、Xu Wenkan(徐文堪)、Zhang Baichun(张柏春)、Zhou Zhenhe(周振鹤)和 Zou Zhenhuan(邹振环)。

还应特别感谢布里尔学术出版社的编辑们,阿尔伯特·豪夫斯塔特(Albert Hoffstadt)和帕特瑟·雷德(Patricia Radder)高兴地承担了本书最后阶段的工作。

我们还要感谢来自朋友和同事们的大力帮助。他们用他们的专业技术和职业技能对书稿的最后完成作出了贡献。塞尔克·杰夫克(Silke Geffcken)和克斯特·帕克(Kirsten Pahlker)在将不同格式的论文统一成连贯的文稿方面,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帮助。我们还要感谢马修斯·内登夫(Matthias Niedenführ),他在最后阶段参加进来,用他的敬业精神和敏锐目光完成了对稿件的最后校对工作。米歇尔·斯切莫帕芬尼格(Michael Schimmelpfennig)读了部分原稿并提出了颇有见地的意见。陈琼(Jane Chen-hsiu Chen)对我们翻译中文论文提供了极大帮助。保罗·伯曼(Paul Bowman)情愿承担枯燥的工作,对那些母语不是英语的作者提交的英文论文进行了润色。

我们最后的但并非分量最轻的感谢,要给予阿梅隆(Iwo Amelung)和顾有信(Joachim Kurtz)。自始至终,每当需要时,他们总能给我们随时提供他们技术的、学术的、情感上的支持。其余所有错误、遗漏和矛盾之处,由编者负责。

朗宓榭(Michael Lackner)
费南山(Natascha Vittinghoff)
哥廷根,2003年4月

论文作者

艾乐桐(Viviane Alleton)

(法国)巴黎高等社会科学研究近现代中国研究中心

阿梅隆(Iwo Amelung)

北京大学德国研究中心,(德国)图宾根大学

荒川清秀(Arakawa Kiyohide)

(日本)爱知大学

毕鄂(Wolfgang Behr)

(德国)波鸿大学东亚研究所

本杰明·A·艾尔曼(Benjamin Elman)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

杰琳德·吉尔德(Gerlinde Gild) (德国)哥廷根大学东亚研究系

海伦娜·赫尔罗尔多娃(Helena Heroldová)

(捷克)布拉格查理士大学

燕安黛(Andrea Janku)

(德国)海德堡大学汉学系

白莎(Elisabeth Kaske)

(德国)海德堡大学汉学系

顾彬(Wolfgang Kubin)

(德国)波恩大学汉学系

顾有信(Joachim Kurtz)

(美国)艾默里大学俄国和东亚语言文化系

朗宓榭(Michael Lackner) (德国)爱尔兰根·纽伦堡大学汉学系

米歇尔·C·莱依奇(Michael C.Lazich)

(美国)布法罗州立学院历史系

李博(Wolfgang Lippert)

(德国)爱尔兰根·纽伦堡大学汉语言文化研究所

马军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安格里克·C·麦思纳(Angelika C. Messner)

- (德国)基尔大学汉学研究所
 费乐仁(Lauren Pfister) 香港浸会大学宗教系
 冯尼·斯科尔日·仁达(Yvonne Schulz Zinda)
 (德国)哥廷根大学东亚研究系
 莎拉·E·斯蒂芬斯(Sarah E. Stevens)
 (美国)印第安纳大学伯明顿分校
 鲁纳(Rune Svarverud) (挪威)奥斯陆大学东亚研究所
 苏荣誉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邹嘉彦(Benjamin K. T'sou)
 香港城市大学语言资讯科学研究中心
 费南山(Natascha Vittinghoff) (德国)法兰克福大学东亚研究系
 鲁道夫·G·瓦格纳(Rudolf G. Wagner)
 (德国)海德堡大学汉学系
 王宏志(Lawrence Wang-chi Wong) 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系
 黄文江(Timothy Man-kong Wong) 香港浸会大学历史系

序 言

朗 宓 榭

北宋文学家苏轼(1037—1101)在他的杂文集里,讲述了这样一位学者的故事:他第一次参观一家官库时,不认识储藏在那里的钱。问他为什么不认识,他回答道:“固知其为钱,但怪其不在纸裹中耳。”^①将 19 世纪后半期绝大多数中国士大夫和正在兴起的知识分子群体对于西方知识的态度,比作这个不认识钱的书虫(他仅熟悉钱的一种外观),是十分恰当的。进口来的知识,几十年当中其名称从“洋学”到“西学”,最后成为“新学”,被认为是在内容和知识结构两方面与古老的中国传统知识大相径庭的东西。然而,根据中国精英们的理解标准,新知识只有“被纸包裹”时才能接受。即使在从读书到研究“自然世界这本书”的转变过程中,写在纸上的字词仍是主要的工具。因此,人们常常偏重研究中西学者关于自然现象的描述,而忽略对自然现象本身的观察。同样,晚清诗人很少注意掠过湖面的云朵,而热衷研究此前较有创造力时期的诗人如何描写这些云朵。在这样一种书本世界里,甚至试图证明中国经典中已经包括了现代知识的要素的努力(因而,表明人们仅是论证一种所谓的“新”现象),都深深地扎根于一个不可超越的对词汇的信仰(对

^① 苏轼:《东坡志林》,第3章,第32条,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108页。

这些词汇的理解强烈依赖于古代典籍和新造术语之间多多少少的偶然巧合,新造术语常常按照古代术语来命名),因而强化了各种各样的语言崇拜。

在理论认知方面不愿睁眼观察,在技术的实际运用上,也几乎是断然排斥的态度。张之洞(1837—1909)于1898年捡起对于中西文化的区别的旧观念,使臭名昭著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公式风靡一时,他指的是西学的效能方面。重要的是,他将铁路作为主要例证。然而,在19世纪晚期的中国,精通实际技能的人们的地位并未得到提高。工程师(engineer)一词的词根是“ingenium”或“génie”,这个词根给了该职业一种尊贵的地位,使他们成为西方社会精英中的一员。但对当时的中国学者和知识分子而言,这是不可思议的。技术工作交给不重要的畴人,或至多是二流的知识分子(换言之,能生产有用物品的人们)。而那些以保持“中学为体”为己任的人们,屈尊地指导和监督必要的技术工作。士人仍在读写他们所读的书。西方科技被看作奇技淫巧,被看作属于低等的事情。甚至受鄙视的买办,或待遇极差的通事,由于他们仍在进行着文字工作,他们比那些技师和匠人更易于与精英们的行为标准和谐起来。中国现代化延误至20世纪晚期的悲剧可以从这种对体力劳动的根深蒂固的厌恶中得到解释:无论是民国时期西方化的“科学”论战,还是此后的“苏联化”,用煤一样黑的工人和乐观的工程师形象取代传统的精英自我感觉,都没有取得持久的成功。名为“中国科技史”的学科的建立意在救治民族自卑心理,但该学科只是在20世纪最后十年里才在公众心理中生根。即使是决心使全民成为自我造就的工程师的“大跃进”运动,也成为一场灾难性的失败。直到目前,中国的“物理的”硬件技术仍是令人叹息。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在“较软的”技术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在“清洁”领域,根深蒂固的精英态度似乎最终与(后)现代时期的需要取得一致。

跨文化转移理论，特别是那些欧洲内部文化转移过程理论，有时可能低估文化迁移过程中可能发生的语义断裂的重要性。诚然，一切文化转移过程的规模、速度、节奏和结果都受到相关社会团体的需要和利益以及政治决策者的意愿的影响。同时，这些过程不管发生于何时何地，都是依照时间顺序来进行的。不过，在一种其精英几乎完全依赖于书本的权威而忽视其他任何证据的文明里，对于“新”和“旧”的界限的划分以及随之而来的两者的融合，词语变成至为关键的工具。在这种语境下，不需要建立“起源的神话”，因为精神的发展史揭示了在对待具体和抽象的态度上具有足够的行为连续性。而且，汉语过去在处理外来概念方面有某些经验。无论如何，不考虑最重要的媒介——术语，就不能对知识整体及其结构的重大转变作出表述。虽然术语的迁移历史永远不会停止，这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相对短的时期中，词汇转变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清楚地支持这样的假说，即(存在)一个形成期，该形成期仍在继续不断地塑造着中文话语。

中国思想史和西方思想史都经历了几次决定性的断裂：对于汉语世界，我们应记得佛教的传入或宋代理学的兴起；对于西方世界，我们会想起笛卡尔转折或启蒙运动。这些断裂的结果之一是古代文本不再像先前那样被解读(和理解)。文化内部翻译进程开始发生。词汇的意义和它们在多少具有连贯性的体系里的映象发生变化。在西方，“翻译权”(translatio imperii)的概念，即承继古代文化遗产的职责经常从一种文明(及相应的语言)转向另一种文明，持续不断的翻译便成为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同时，“翻译权”的概念，总是指同一个“权”(imperium)。这养成了这样的信念，即所有的断裂、变化和修正都来自内部而不是外部。“亚里士多德是一个西方哲学家，但他讲着不同的语言”一句话，只有同时反过来读“亚里士多德讲着不同的语言，但他是(而且永远是)一

个西方哲学家”时,才能显示其全部含义。至少,在理想的西方自我理解的领域,文化的连续性和不连续性就这样处于一种令人鼓舞的平衡中。

中国缺乏类似的思想,这必然相对降低了翻译的欲望。佛教,一个确切无疑地来自外部的信仰,经历几个世纪才在中国扎根。它的世界观仅对传统的知识映象和汉语词汇进行润饰而没有将其完全改变。而且,只有一小部分中国人涉身于令人印象深刻的佛经翻译工作,宋代儒学,部分受到佛教思辨形式的影响,极大地改变了对中国典籍的核心部分的解读,但在那时人们很少意识到这是一种翻译行动。不过,从19世纪中期以来,中国成为世界翻译共同体中的一员。要评价翻译所引起的与传统的断裂程度,和西方类似的断裂进行比较,是很困难的。然而,说翻译工作的速度和规模是前所未有的,应该不会错。当翻译顶峰到来时(大约1900年前后各十年),不仅获得了一种新的精神形态,而且,中国传统自身也被迫与西方挑战相适应。一个新的术语系统和新的概念世界帮助传统儒学者从事新的职业,起初作为自然哲学的专家,后来又成为道德哲学家;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将成为一名教师、宗教哲学专家等等。当浙江的学者在清代中晚期重新发现了墨翟(前5世纪)的作品后,这本以作者名字命名的被长期遗忘的著作成为中国在光学、机械学、逻辑学及其他领域的“中国科学”的主要权威作品。中国过去的重要问题无不按照新意义的线条及其映像来进行解释。然而,这种狂热的翻译活动并不一定意味着已经意识到中国的“翻译权”。试看上引亚里士多德的话,人们或许会说“孔子是一个永远讲汉语的中国思想家”。中国语言的虚幻连续性及其所代表的文化倾向掩盖了一个事实:20世纪的儒学者说一种与其前人大不相同的汉语。因此我们可以说,他经受了一种复杂形式的语言疏离。

在此语境下讲起疏离,断裂的深度还不足以说明其正当性

(虽然断裂之深超出大多数西方人的想象),造成疏离的更重要原因,是因为“新”知识源自外国,其被接受的时间极短。断裂由外部引起,这一事实直到今天对中国人身份构建还是至关重要的。无怪乎在和语言最有关的领域——人文学科和一般而言所有含有丰富文化基质的领域,疏离被更强烈地感觉到。

虽然中国为成为全球翻译共同体的一员付出了代价,但是新的语言是一种新的“中国”语言。中国从来没有完全失去对其政治和语言主权的控制。中国与其过去和传统分离的故事,相伴随着巨大的成功的故事。这种成功,使中国在几十年内赶上了现代性,至少在读写方面是这样;又用了—个世纪的时间,创造出了进行实践的领地,在这里,书本上的东西不起类似的关键作用。

本书是“近现代汉语学术用语的形成”研究项目的第二本专著。^①我和阿梅隆、顾有信从1996年启动该项目。在此期间,我们拓展了我们起初较窄的术语路径,建立了一个初步的数据库,^②包含中国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新术语大约127,000词条。1999年12月的会议打算扩展正在进行的研究的框架,将词语和概念的迁移历史置于一个逐步增长的社会、政治的和制度的语境下。由于费南山是会议组织者之一,又是本书的编者之一,不仅作了多方面的艰苦努力,将本书连贯起来,还在她写的导论中,表达了我们对于某些个人和机构所应有的感谢,因此,感谢她,这是我的快乐。

朗宓榭

爱尔兰根,2003年12月

① 参看朗宓榭、阿梅隆、顾有信:《新思想的新术语:中华帝国晚期的西学和词汇变化》,莱顿、波士顿、科隆:布理尔学术出版社,2001年。

② WSC数据库:产生于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的中国科学、哲学和政治术语的电子数据库。在线可用网址:<http://www.wsc.uni-erlangen.de/wscdb.htm>。

目 录

上 册

导论	费南山 / 1
----------	---------

全球知识的政治学

从前近代中国的“格致学”到近代

中国的“科学”	本杰明·A·艾尔曼 / 25
19 世纪中国新学领域的社会活动家	费南山 / 79
日语和汉语中“政治经济学”术语的形成和发展	李博 / 125
汉语“劳动”术语发展史札记	鲁道夫·G·瓦格纳 / 135
晚清西方军衔名称翻译简要研究	马军 / 149

话语的界面：语言和媒介

译者言易也

——语言的多样性和中国古代表示“翻译”的词语	毕鹤 / 175
通过语言迁移语法：汉语个案	艾乐桐 / 217
重释“信、达、雅”：晚清的翻译问题	王宏志 / 247

呈现意义:

晚清中国新学领域

官话、白话和国语

——20 世纪初中国“国语”概念的出现 白莎 / 271

在中国传播实用知识:广州贸易体制

时期的信息战略 米歇尔·C·莱依奇 / 309

转变文体:LEADING ARTICLE 如何变成社论 燕安黛 / 333

汉语词汇的历时性和共时性变化比较研究 邹嘉彦 / 359

下 册

学科的构建

命名物理学:中华帝国晚期近代科学学科的

竞争性表述 阿梅隆 / 383

中华帝国晚期“考古学”及“史前史”概念的

接受和考古学的确立 苏荣誉 / 421

日语地理学术语的形成和传播 荒川清秀 / 447

将名称和实际配对:翻译和中国逻辑学的发现 顾有信 / 465

中国国际法术语的形成:1847—1903 鲁纳 / 501

玻璃潜艇与电子气球:中国科幻小说

中科技词汇的构词法 海伦娜·赫尔罗尔多娃 / 529

西方冲击下中国近代音乐理论

和术语的演变 杰琳德·吉尔德 / 547

心灵和思想领域的知识

翻译如同摆渡:吴历(1632—1718)的《三巴集》 顾彬 / 569